

根源与路径：传播思想史的观点解读¹

夏春祥

书籍信息

《抗击柏拉图的阴影——人类传播研究导论》，麦可·杜斯、玛莉·布朗著，夏春祥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135页，ISBN：978-986-341-312-7，新台币300元。

关键词

人类传播研究、希腊城邦、雅典遗产、语艺修辞、口语传播

作者简介

夏春祥，世新大学口语传播学系教授、《传播研究与实践》(TSSCI)期刊主编，电子邮箱：chhsia@mail.shu.edu.tw。

Roots and Routes: Rethinking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Hsia Chun-hsiang

Book

Boxing Plato's Shadow: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By Michael Dues & Mary Brown, Translated by Hsia Chun-hsiang. Taipei: Wunan Book Publishing Co., Ltd, 2017, 135pages. ISBN: 978-986-341-312-7, NT\$300.

Keywords

Stud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Greek city states, Athenian legacy, Rhetoric, Speech communication

Author

Hsia Chun-hsiang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Shih-hsin University. Email: chhsia@mail.shu.edu.tw.

教书以来，常有学生问及：传播到底是什么？这是个关于根源的大哉问，回答方式很多，得依情境而定。然而，学生会这么提问，多半是因为接触这门学科的知识面向已有一段时间，不同的片段纪录、不同的诠释脉络，以及自身现实生活中的经验却使他如同印度《涅槃经》的摸象盲人一般，总会陷入重重迷雾之中。

一、传播的学术理路

在学界的理论面向上，“传播是什么”的源起探询会让人们联想到二十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以后德国纳粹（1933—1945）崛起的发展脉络，那种运用新媒介（有声电影与无线广播）创造出一个独特社会场域，继而让每个生活其中的人以一种高度雷同的效忠姿态来表达自身存在的历史事实。女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 1902—2003）的经典作品《意志的胜利》（1935）与《奥林匹亚》（1938）便是典型案例；这种因为宣传而构成的总体战争，便是今日学术社群中传播研究的孕育脉络之一。

而为了与希特勒政府及其轴心国家相抵抗，美国政府邀请了来自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背景的学者共同研拟相对应的宣传策略与因应之道；其中一位学者宣韦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后来被认为是传播学门的集大成者。他的努力促成了美国各地公、私立大学传播科、系、院、所的大力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学者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 Lazarsfeld）、政治学者哈罗德·拉斯维尔（Harold Lasswell）、研究说服策略的卡尔·霍夫兰（Carl Hovland）与探讨团体动力学的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共同被视为这个学门发展历程中四位重要的奠基者（罗杰斯，1997/2005）。

在二零一六年的此时此刻，这样的论述可被视为是大众传播领域的历史建构内涵。然而，从关注整体社会的讯息传布与文化效果来看，同样问题却也可以成为不同发展路径的另研究取向出发点，那就是认为传播媒体中介下的大众文化，已有商品化及标准化倾向，继而让人们生活其中而渐次异化、丧失启蒙力量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庆幸自己关注文化而未陷入大众传播陷阱，转而关注成人教育与积极转化的伯明翰学派。在历史的某一个阶段中，这两个取向都生猛有力地推动了传播研究，继而让传播研究者也感受到资本主义在不同时期的历史转变。在这里，大众传播媒体当然是文化繁衍的重要机制，只是还有一类取向的学者们更倾向于使用媒介（media）及其相关概念，来为传播研究的理论深度做拓展，借以呼应社会中那不断变迁而且产出媒介化（mediatization）与中介化（mediation）新面貌的传播技术，这包括了加拿大的多伦多学派、美国关注媒介生态环境的纽约取向，以及德国、法国、中、南美洲那些关于媒介身体与文化技术的思考视野等。

二、传播的实践应用

只是，在这本导论性著作中，两位作者并未采取上述的学术视角，反而将学门认同的不稳固，视为是整个阐述的基本起点，这是一种思想史的探索姿态（夏

春祥, 1998)。他们指出传播行为引人入胜、传播研究却备受争议的吊诡 (paradox) 首先在于关注焦点不断转换, 而概念标签也不断更动, 直至约翰·洛克 (John Locke) 在十七世纪打造出“传播”词汇之后才渐次固定, 这造成对象主题与研究边界并不清晰。第二个问题则是传播行为作为一种过程, 对人类互动来说不可或缺, 难以从其他学门分离出来。最后的矛盾点在于人们利用传播共享真理和建立团体的同时, 也可以用它来进行欺骗和剥削他人; 柏拉图因而强烈反对古代雅典的修辞学教育, 对于这种直接落实抱持保留态度 (杜斯, 布朗, 2004/2017)。

杜斯与布朗 (Michael Dues & Mary Brown) 并未回避这些吊诡, 反倒是直指核心地关注这种以传播之名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投身其中的实务角度: “实践应用” (practical application)。这概念在本书导论以来的各个篇章都有提及, 其中隐含提及或具体指涉的明确案例有公共演说、议会辩论、宗教传道、文学朗诵、广告宣传、讯息设计, 以及团体动力经营等等。

令人喜爱的是, 实践应用使得传播学门在不断转型间充满蓬勃生气。一方面, 随着社会的变迁, 传播的实践应用往往有着浓厚的技术性格, 他带来了与时俱进、别开生面的各种物质基础, 如智慧手机、虚拟实境等; 另一方面, 各种与实践应用有关的工作总是带给人们美好的想象, 也吸引着年轻人不断投入, 譬如: 新闻记者、文字编辑、主持播报等等 (夏春祥, 2002)。当然, 这些工作机会或许造就于发达国家的商业市场, 也有可能是孕育在冷战时代东西阵营对抗下, 不同国家制度的各自社会脉络, 读者在使用本书时必须有这样的意识与觉察才能有更深入的体认与学习。诚如作者 (2004/2017: 2) 在导论“探索沟通”中这样写道:

一旦认定了更好的沟通和更好的生活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 我们便会注意到在很多不同文化的历史记载中, 沟通始终是被认真研究的主题。第一本讨论这个主题的书几乎跟书写一样古老。大约公元前2675年, …而在十五世纪早期, 一位日本作家世阿弥 (Seami, 1363–1443) 提到, 言说、论述的终极目标是“存在于语言的优雅和对贵族及名流演说的完整掌握; 只有如此, 信手拈来的随意表达也会变得优美”…。

如果“传播是什么”的提问者心中萦绕与关注的是这些实务工作, 那么回答中所提及的发展路径, 便会因为各种工作内涵而截然有别。只是在学术建制的发展历程中, 这些实务工作相对应的学术建制都会被画归在传播学门之内。于是乎经常出现一些情况, 有兴趣于实务工作的学习者会完全不知道上述学术脉络发展下的传播理论,

与“以传播之名”的实务工作有着什么样的关联性？而且，困惑都还在心里逐渐形成之时，那种学界关于传播的根源厘清就已孕育出不同流变的发展路径。前面关于学术视野的段落论述，讲的就是这样的背景故事；大体来说，很多学者也指出：过往以大众传播来构思传播概念的整体内涵被视为是一种相较局限的发展方式，与之相对的便是在公元两千多年前，曾经存在于一群智辩士与希腊哲人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之间的语言交锋，这被视为是另一种滋养传播研究的发展根源。

三、语艺修辞与口语传播

本书两位作者从这个重视语言实践起点出发，回顾了希腊、罗马时代（包括在地中海四周所发生）与天主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宗教有关的种种变迁。这是个挺精彩的起源论述，尔后则触及到了这些被发展出来的传播知识如何被传承下去的历史过程，提及背景包括了柏拉图的《对话录》、亚里斯多德（Aristotle）的《修辞学》、亚历山大大帝、克罗狄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罗马帝国，以及北非传承伊斯兰文化的摩尔人（Moors）等。

在论述过程中，罗马演说家马库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北非的主教圣·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法兰西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穆斯林逻辑学者艾威洛伊（Averroes）²、熟悉拉丁文、推动加洛林文艺复兴的艾尔肯（Alcuin of Notker）³，以及凯尔特人约翰·史歌德（John Scotus）⁴等很多人物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共同奠定了语艺修辞传承的知识基础。而对人类本质和潜力全面理解、发展和颂扬的人文主义，则成了这些知识背后的重要内涵；同时，在所有事情上都博学多闻且有一技之长的“宇宙人”（universal man）也成了与之相应的描述形式。

这种与西方社会演变密切结合的流变历程曾经推动了古典学术的发展，尤其是关于我们称之为语艺修辞学的整个内涵，都是书中试图记录下来的重要知识。在具体脉络中，这样关注口语传播的思路被总结为传播学门中的人文主义学派（第三章），而上述孕育于大众传播脉络下的发展则被视为是科学主义取径（第四章）。这样一来，一种包含口语文化、重视人际互动的口语传播，便与包含在各种不同时代下的新媒介文化、重视传播效果的大众传播，共同形成了今日传播学门的具体内涵。在这样的路径下，本书第五章“传播研究的今日与明天”还对传播学多元的分科作了清楚介绍，你可以从中看出传播学的蓬勃发展。本书还带领读者思考传播学未来将面对的挑战，其中“传播科技”不断变迁为传播学带来的威胁与机会，更是每位学习和研究传播的人都必须不断思考的关键问题。

跨越不同学科界线的科际整合，乃是传播学门的独特性质；作者站在这个立足点上，将传播研究描绘为一门“流浪者的学科”（discipline of refugees）⁵。他们观察到许多传播学者在开始学术生涯时都意不在此而是希望成为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文学批评家或历史学家，他因而提出了一个后现代取径思考中很少会被这么谈论的本质问题与根源界定。很明显的，一个可以涵盖丰富面向、不同路径的根源探问，在此形成了一个关于传播学门的大叙事（grand narrative）。这样的教科书论述似乎与当代重视各自差异的民主氛围有点格格不入，可是对于在实务界，或是有着各自不同关怀的学术研究者来说，这种宏观论述正是学界中人在重视实务的环境中尝试界定自身的一种持续且不间断、永远不忘初衷的正当性努力。

而作为与实践应用关系紧密的独立学门，传播研究更应关心如何拿捏分寸的伦理问题，这也是本文以为与说话、思考息息相关的人类传播行为，应该作为传播学门关注焦点的重要依据。但是在今日学科发展历程中，这样的一个特质与对象却一直坎陷在那种自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以来的科学风潮之中，人文面向的备受忽略使得传播研究难以擎起现代科学的大旗，甚且也无力面对那种转向自身的反省思考。因此，作者们写道“那些对传播研究与实践的毁谤和轻蔑，传播的黑暗面向持续提供可以相信的证据”。

四、在柏拉图天空下

作者们以“柏拉图的阴影”来为本书命名，是因为在两千五百年前，柏拉图因为亲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用心思考却因语言获罪的具体经验，因此对于那些在意语言艺术的修辞技巧，却未能以严肃关怀来追求真理者抱持强烈的不信任。他于是将那些智辩士描绘为诡辩家，也将诡辩当中的修辞技术视为是一种自私人性的体现结果，这就造就了今日语艺修辞与传播研究背负的沉重负担，相关思考也容易被认为用来增进私人利益或商业利润，继而将绝对客观真理与公共价值置之于后。

在书中，这被视为是“传播的黑暗面向”。其实，这无非是人性的黑暗面向。而这种千、万年以来始终没有也不可能臻至完美的人性，构成了各种人文、社会研究的推动力量，传播学门自然不必例外。只是，作者使用“阴影的”比喻，是要提醒对于传播实务或学术研究有兴趣的关注者，要有意识地觉察到自身所处的脉络。作者以此来说明传播研究，有点像传播研究中对于效果探索传统的典型评价一样，其实容易陷入一种单面化的标签或过于偏狭的概化，可是反过来说，两位作者却以一个这样的出发点，将我们带入一个沿途风景相当瑰丽的发展路径。

只是，柏拉图更让人知悉的是他关于黑暗洞穴的寓言。过往，有个拥有长长通

道连向外面开口的黑暗洞穴，阳光从开口照射进来，但因为洞穴深，所以洞深处还是一片黑暗，黑暗中有一群手脚被缚、无法转身的囚徒，以及一个火堆，同时有一些花草与石头；藉由火的光，囚徒可以看见花草与石头映在石壁上的影子，但看不见花草与石头，他们从小到大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所以他们认为真实的，就是那些反映在石壁上的阴影。某日，有个人被解开束缚，可以自由转身，起初也不会习惯新的知觉，更不可能直视火光，但慢慢的，他会发现石壁上的舞动只是花草、石头的反映；他更进一步，沿着洞穴出口走出来，他终得见太阳与真实之物，同样起初他也不会习惯，太阳的光对他来说也太过强烈，但慢慢的在广阔视野下，他会发现到一个崭新的、真正的世界（柏拉图，2003）。

而与此相较，作者们在第一章后面，透过援引知名学者约翰·彼得斯（1999/2017）的经典作品*Speaking into the air*，来介绍柏拉图老师苏格拉底关于亲密互动、认真看待他人的关系沟通原型，也具备与此预言相同的启迪功用，对于后来在柏拉图天空下传播概念的完整申论，更是不容忽视，而这一讨论模式也在本书其它章节中持续看到。

个人很高兴有机会将此书翻译为中文，也希望读者们能因此看见一个打破习惯性认识、更为广阔的真实世界，并且与我们使用中文的传播社群相分享。用出身于历史专业的人类学者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的话语来表述，广阔的世界充满着各种找寻出路的可能性，问题在于我们愿意用多少的宽容来看待差异，又能拥有多少超越现实局限的人文想象来引导我们（Clifford, 1997）。显然的，希腊哲人们的想法有助于我们打破传播学的过往认知，替我们架构出不同的视野；在新世纪的未来，传播已然是极富生命力的探索学科，而每条路径都有可能成为另一片繁茂生长的块茎（Rhizome），哲学家德勒兹与加塔利以“界于中间”（in the middle、between-ness）（德勒兹，加塔利，1980/2010）的视角提出媒介化的深刻演变，任何零星节点都有可能是下个世代的星丛动力。在注重脉络情境的情况下，所有理论发言的主体诠释应加以并置，创造出众声喧哗（heteroglossia）的觉察意识，本文的书写遵循此一理路，以期待为下个世代腾出趋近复杂真实的可能空间（夏春祥，2002）。

而为了方便参照，编辑于文稿两侧标示英文页码，索引中所列即可在这些数字中查考。而在书名翻译部分，个人也想对思索历程做个简单交代，副标题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uman Communication译为“人类传播研究导论”应无争议，主标题中的Boxing Plato's Shadow后半部的“柏拉图的阴影”也清晰易懂，毕竟有系统探索传播行为的黑暗面向，最早是由柏拉图所揭示，而他想反击的是那种促成暗黑力量成形、来自异乡外邦的智辨士们；只是Boxing一词，个人几经斟酌，

在考虑过“搏击”“对抗”后决议采用武术格斗中的“抗击”词汇，取其在打击过程中对抗与反击之意（承受抵抗之余才有力量可以反击），毕竟在学习理论知识过程中，这种随着实践应用而来的想法与对经典论述的质疑，是师生讨论过程中极富价值的冲突，因为它可以创造对话，并且丰富学生们的思索，教师们甚至可以在此教学相长，就如同拳击竞赛过程之前的练习挥拳一样，我们在接触理论观点时应该抱持不盲目信任的态度，继而在练习中摸索着对自我与外在世界的认识（彼得斯，2003/2013），而非将之视为是传播学门发展历程中无关紧要的自然而然，甚或是应该避免的关系冲突。因此，书名的完整翻译确认为《抗击柏拉图的阴影——人类传播研究导论》，希望关心传播的读者们能对此意旨有所警惕与自立自强，继而发展自己对于传播行为的完整观察。

本书翻译始于2011年前后教授“人类传播思想史”（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Human Communication）课程的需要，感谢从那时起到2015年，来自海峡两岸与台湾各地的研究生、交换学生都在过程中提供不可或缺的协助，尤其是世新大学口语传播学系的沈锦惠（1956—2015）、温伟群、游梓翔、辅仁大学的林静伶、厦门大学李展、华中科技大学唐海江，以及北京大学陈汝东等诸位都给予个人实质的建议；谨以此书译文献给英年早逝，留下对语艺、修辞正值巅峰、观点新颖的沈锦惠（2009，2014），个人是在她引导下开展学习，进而循序渐进地认识这个领域。在台湾，由于林静伶等学者的努力，主张“修辞”较为局限且特定，难以充分表达这概念原先所指涉的那种丰富存在，因此主张以“语艺”新概念加以取代（林静伶，1993）；本书翻译大体延续这个脉络，只是在大陆，“修辞”的使用更为普遍，毕竟语词虽旧，亦可重铸新意。两个概念该如何使用、交流与对话，也许是我们不能简单忽略的自然而然，因此行文论述中常交互运用，毕竟他反映的是华人或使用中文的传播研究社群如何看待传播行为、如何发展自身学科主体性的一次崭新起点；因此，在概念使用上，也许可以放慢速度，接受更多质疑与讨论，是为译序。

（责任编辑：吴欣慰）

注释 [Notes]

1. 本文为书籍《抗击柏拉图的阴影——人类传播研究导论》(2017)的翻译者序言，后经作者调整、删改而成，可说是该书的导览性介绍。
2. 这是拉丁文名字，即阿拉伯世界知名的中世纪伊斯兰学者伊本·鲁世德（Ibn Rushd，1126-1198），出生于西班牙。
3. 艾尔肯生于英格兰约克郡，后被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的查理曼大帝邀请到宫廷中，曾对

各种文本的《圣经》进行校勘，并译成拉丁文，成为天主教的通行版本。查理曼大帝统治期间，欧洲各地充满文盲，除了教士外，几乎没有识字人口。他一方面要求每座教堂或隐修院兴建学校与图书馆，并用拉丁文教授几何、算术、逻辑、语艺等。

4. 约翰·史哥德全名为Johannes Scotus Eriugena（815-877），他的语艺修观辞点重视逻辑的完整性。Eriugena代表生于爱尔兰，Scotus在中世纪是拉丁文中的凯尔特人，一种生活在欧洲的古老部族。因此他的名称便是“生于爱尔兰的凯尔特人约翰”。
5. 这字词由美国历史与传播学者，也是两位作者想要致敬的资深教师罗伯特·刚德生（Robert Gray Gunderson, 1915-1996）所使用。刚德生1949年于威斯康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55年升为教授。1952年起兼职担任印第安纳大学口语系主任，1958年后专职任教于印大口语与戏剧学系，教授美国殖民时期到罗斯福新政之间的公共沟通，前后指导近五十位博士生。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柏拉图（2003）。《柏拉图全集》。台北：左岸文化。
- 德勒兹，加塔利（1980/2010）。《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 E. M. 罗杰斯（1997/2005）。《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麦可·杜斯，玛丽·布朗（2004/2017）。《抗击柏拉图的阴影——人类传播研究导论》（夏春祥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林静伶（1993）。民主自由与语艺生存空间。《传播文化》，创刊号，67-80。
- 沈锦惠（2009）。《电子语艺与公共沟通》。台北：天空数字图书公司。
- 沈锦惠（2014）。隐喻即可视化的语艺行动：网络时代谈视觉语艺的古典根源。《中华传播学刊》，（26），63-106。
- 夏春祥（1998）。什么是传播思想史？谈传播研究中的历史问题。《传播研究简讯》，（12），8-9。
- 夏春祥（2002）。众声喧哗的迷思：关于传播研究的笔记。《中华传播学刊》，创刊号，3-26。
- 约翰·彼得斯（2003/2013）。绪论：足堪屹立的肩膀。载卡茨等（主编），《传播研究的典律文本》（夏春祥等译）（第i-x页）。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约翰·彼得斯（1999/2017）。《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Clifford, James. (1997).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U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